

# 现代性转型期青年自我认同危机的共相与殊相

## ——《在轮下》与《沉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宋子玉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要

《在轮下》与《沉沦》分别以德国神学院学生与中国留日青年为典型个案, 揭示现代性转型期青年在制度变迁与文化冲突中出现的自我认同危机。文章以G·H·米德的符号互动自我理论为主框架, 结合文本细读与结构比较, 论证两位主人公的危机具有“同构性”: 社会加压将“泛化的他人”实体化为持续在场的单一期待, 个体将其内化为僵化的“客我”, 压制“主我”, 导致反思性对话断裂与自我整合失败。与此同时, 德中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危机呈现出“形态殊相”: 前者集中于教育体制的理性化规训与个体情感价值的边缘化, 后者显现为“救亡叙事”与传统性伦理叠加下的外部歧视与内部自责相互放大。文章意在经由跨文化对读, 澄清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诉求与社会整合之间的互动机制之普遍性与特殊性。

### 关键词

《在轮下》, 《沉沦》, 自我认同, 米德, 现代性转型, 跨文化比较

# The Universal and Unique Aspects of Youth Self-Identity Crises during the Modernity Transition

##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of *Beneath the Wheel and Sinking*

Ziyu So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anuary 15, 2026; accepted: April 21,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Beneath the Wheel and Sinking* take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a German seminary student and a Chinese

youth studying in Japan, respectively, revealing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 among youth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odernity,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flict. This paper adopts G. H. Mead's theory of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elf as its primary framework, combining close textual analysis with structural comparison to argue that the crises experienced by both protagonists exhibit "isomorphism": societal pressure transforms the "generalized other" into a singular, persistently present expectation, which individuals internalize as a rigid "me," thereby suppressing the "I" and leading to the breakdown of reflective dialogue and failure in self-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result in "distinctiv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crisis: in Germany, it centers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values; in China, it emerges as an amplification of external discrimination and internal self-blame under the overlapping pressures of "salvation narratives" and traditional sexual ethics. Through cross-cultural reading, the study aims to clarify both the universality and specificity of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spiration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during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Beneath the Wheel, Sinking, Self-Identity, Mead,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二十世纪初，全球现代化的制度扩张致使传统社会秩序松动断裂，社会关系分化重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亟需重新协商。德国在工业化浪潮中固守普鲁士训育传统与权威式的严苛教育体制；中国则在殖民冲击与礼教崩解间艰难求索，挣扎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拉扯之中。对社会加速变动最为敏感的青年群体，深刻体验着个体价值认同与集体态度导向之间的巨大张力，深陷个体身份的失衡与认同的崩塌。黑塞的《在轮下》(1906)与郁达夫的《沉沦》(1921)诞生于德、中社会转型阵痛期，二者以结构性的相似，分别书写了一名德国神学院学生与一名中国留日青年走向精神崩溃的心灵轨迹，为透视现代性转型期的青年精神困境提供典型案例。

本文以 G·H·米德的符号互动自我理论为理论取径，辅以齐美尔的“社会形式理论”为结构视角，引入“主我”、“客我”、“泛化的他人”与“陌生人”、“文化悲剧”作为分析框架，结合文本细读与跨文化比较，直剖两部作品中青年自我认同危机的社会心理根源与宏观背景、探究这一过程中现代性普遍矛盾的催化作用、文化语境的差异化塑造；聚焦外在期望被异化为高压且单一的“内在规训”后，青年群体的自我认同如何在主-客我对话的错位中走向崩塌，不同文化机制如何将同构压力转译为异质的悲剧形态。

## 2. 自我认同危机的内在结构根源

依据米德自我理论，自我产生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符号互动，结构由“主我”(I)与“客我”(Me)构成：前者代表自发与创造性回应，后者是内化的社会规范与期待；“泛化的他人”提供可参照的群体价值坐标[1]。个体通过角色取替与反思建立自我认同，其健康有赖于主-客我的持续对话与调适。一旦“客我”在社会强压下僵化为惩罚性枷锁、压制“主我”，这种对话便断裂，主体自我整合随之削弱，危机

以行为失序与躯体症状显现。

《在轮下》中，汉斯并非自主选择，而是在父亲、牧师、鞋匠、教师等共同期望下进入神学院。以“出人头地”为核心的话语，将成绩、名次、服从与未来社会地位粗暴对等；这一家庭-学校-社群的视阈构成了现实中的“泛化的他人”。汉斯将其态度内化为严苛而稳定的“客我”，日复一日地自我监督。其独白中“名列前茅是他坚决想做到的……老师、牧师、父亲、尤其是校长，都在鼓励和督促他不断学习([2], p. 35)”，显示了规范的渗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短暂散步也被视作偷懒并以加倍用功赎偿；教师告诫他不得松懈，否则会“掉到车轮下面去([2], p. 87)”。然而“主我”仍在：汉斯亲近自然、渴望友情，与海尔纳相遇后短暂释放。“一种新的幸福感像新酿的葡萄酒在他的血液和头脑中翻腾([2], p. 84)”，诗与友谊为“主我”提供非工具性的路径。但制度化时刻表与同侪竞争挤压了这段友谊的空间，“客我”随即以“还债”逻辑自我审判，压制“主我”。海尔纳离开、排名下滑与劝退使主-客我对话彻底断裂。汉斯出现头痛、失眠、注意涣散等躯体症状，被病名化为“神经病”；返乡后从候选生到学徒的身份落差加剧失衡，烟酒成为被压抑“主我”的扭曲表达，最终滑向醉酒溺水的含混结局。其轨迹即“客我”在持续加压下僵化为惩罚者，“主我”失语：个体价值被单一标准量化，“我是谁”被异化为“我在排名中是谁”。

《沉沦》中“他”的危机置于文化断裂与民族耻辱的双重阴影下：街头蔑称、同侪疏离与自我凝视交织成“耻/卑”的语义场，“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3], p. 21)”。在米德自我理论框架中，“泛化的他人”可经由制度与话语扩展至民族共同体；在此语境，外部蔑视与内在儒家伦理叠加，形成加倍严苛的“客我”。正常性冲动被立刻判定为“污秽”、“犯罪”，具有欲望的自己被辱骂为“畜生，狗贼，卑怯的人！([3], p. 47)”为对抗自然欲望，“他”以封闭、退避、自责的方式将“主我”推入阴影。偷窥成为被压抑“主我”回应精神压迫的畸形喷口，行为一出即以躯体痉挛、失眠与强迫自白将之重新纳入“罪-耻”链条，几乎无协商空间。与汉斯相似，身体承担了自我整合的失败：记忆力衰退、体力下降、精神阴郁孤冷；但“泛化的他人”呈双重形态——外部为殖民语境的异族凝视与排斥(“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3], p. 47)”)，内部为传统伦理的严苛良心(“万恶淫为首”的封建儒家道德律令)。当“我是谁”的反思被他者蔑视与自身道德监控同时改写为“我不配为人”，自我根基被拔除，“他”最终投海自溺。

由此，文本层面的“内疚/羞耻”情绪、友谊或欲望的受阻、作息与考试的规训、头痛失眠与心悸的躯体化，共同构成“症状链”与“关系中断-自我责罚升级-自毁冲动外泄-悲剧结局”的推进路径。其内在共享同一结构：现代性转型中，制度化教育与殖民关系将“泛化的他人”实体化为强势压力；个体内化为僵化“客我”，使“主我”无法与社会期望对话，被审判与惩戒。当主-客我反思性对话断裂，自我整合失败，危机遂以躯体与行为失序呈现并走向毁灭。

### 3. 自我认同的现代性转型普遍矛盾

不论是《在轮下》还是《沉沦》，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均并非青年坠落的偶然个案，而是现代性转型期两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投射——社会结构巨变与个体适应的能力、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压抑之间的现实冲突，这一冲突同时也是现代性压力下个体自我崩溃的共同机制。

#### 3.1. 社会结构巨变与个体适应困境

自我认同的社会过程本质决定了其生成逻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互文，社会秩序的结构转型必然引发自我认同的深刻重构[4][5]。随着现代性转型驱动工业化、城市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链重组，瓦解传统认同框架，客观文化(制度、知识、技术)的发展则远超主观文化(个体精神修养)[6]，个体逐渐被自己

所创造的客观世界压倒，被迫迅速内化新的社会规范、适应新的社会角色。

《在轮下》中，世纪之交德国急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松动传统等级结构、增强阶层流动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一套新旧交织的规训机制。汉斯的父亲作为典型的小资产者，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两重性特征：既固守“传统的、鄙俗的家庭观念([2], p. 1)”，又将以教育资格为形式的符号资本积累渴望投射在儿子身上。这一张力结构映射了施瓦本小镇这一新兴市民社会的内在冲突——它既在宗教体系内维持着“虔信 - 身份 - 价值”的传统等式，又积极肯定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物质积累[7]。老派的鞋匠坚定虔信派教义，笃信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上帝的忠诚相关联，而青年牧师则已转向对宗教本身的理性审视，科学精神逐渐取代神秘主义。而对其他居民而言，工业生产的现实财富意义已然超越信仰本身。施瓦本这一“泛化的他人”所传递的社会期望，本身便是断裂与含混的。当汉斯从神学院退学，脱离制度化轨道，便无法回应这一混杂的期望体系，进而被传统象征秩序与现实生产体系同时抛弃，沦为符号交换中的“无效主体”。长期依赖成绩排名构建“客我”的汉斯，面对这一模糊、冲突的规范场域，难以调适其内在价值坐标，最终陷入“主我 - 客我”断裂的困境。其自我整合的失败，既是社会认同空间的丧失，也指向现代化转型中个体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本体性焦虑[8]。

《沉沦》中的“他”则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适应困境。王朝体制虽被终结，社会整合却仍未完成；“五四”所呼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仍在传统伦理的厚重帷幕中艰难突围。这一断裂在主人公身上呈现为欲望结构与道德系统的剧烈冲突：他所追求的自由恋爱、纯真爱情与自然生理冲动，被内化的“万恶淫为首”这一儒家传统道德训诫持续审判，形成自我指涉的伦理困境。与此同时，积弱国情的现实与民族危机的深化，构成笼罩个体命运的外部他者秩序：甲午战后，中日地位急遽逆转，日本社会日趋强烈的文化优位心态转化为对中国留学生具身的排斥机制；不断强化其“弱国子民”的身份创伤。这一殖民他者凝视，与儒家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律令相互叠加，共同构筑了无法逃离的“客我”牢笼。

在此语境下，民族认同的溃散不仅剥夺了个体社会自我的建构基础，更使“主我”在传统 - 现代、东方 - 西方、欲望 - 道德等多重矛盾中丧失表达空间；在对抗外侮与维系伦理自洁的双重适应任务中动摇承载根基。社会剧变要求青年迅速找到新的位置与意义，而当流动、不确定的个体身份无法锚定于任何稳定的意义结构，自我整合的失败便成为现代性悲剧的必然结局，《沉沦》正是这一精神地形图的文学显影。

在两部文本中，分别构成“泛化的他人”的小镇的上升话语与他国的异族凝视，都以现代性转型期的结构剧变为背景，对青年主体发出“立刻适应”的命令；当“客我”因“超载”，且无法与“主我”的自然需求达成稳定有效的协商时，个体便在失配中坠入认同危机。

### 3.2. 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压抑

《在轮下》中，工具理性的典型场域正是神学院的暴力规训。其高度理性化的管理制度、考核机制、竞争激励，将学生的时间精细切割，行动精确规训、评价精准量化，目的在于生产符合体制需要的驯服精英：“成绩 - 排名 - 奖惩”的链条层层加码，睡眠与休憩被牺牲为可交换的“高分”。神学院这一“泛化的他人”不断对学生的“客我”进行异化，使之沦为制度规训下的精密齿轮。被异化的“客我”则同时挤压“主我”的生存空间——工具理性的膨胀伴随着价值理性的压抑[9]。个体的情感需求、创造冲动、精神追求等价值理性内容被边缘化为个人发展的障碍。汉斯对自然的敏感、对诗与友谊的热爱，在这种逻辑中被归类为“分心、无用”，需要用“更努力”来抵消；此外，其“主我”的自我表达空间被不断侵占，进而削弱了与其他个体进行符号互动的根本动力。

而《沉沦》宗法伦理残存与民族危机并行的语境里，“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将青年自我价值的评

估系在民族兴衰之上，暴露在民族危机与文化冲突的多重绞杀下。“他”以民族尺度检查自我行为，压抑“主我”的情感与欲望，吞噬了个体尊严与生命欢愉。偷窥后的强烈自责，并非只因伦理越界，更因他将个体之羞与民族之耻短路相连，使自我惩罚成倍叠加。就此，关乎个体对“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10], p. 75)”的价值理性的追问，被“是否有益于民族([10], p. 75)”的工具理性话语压到近乎无声，自我认同建构缺乏情感与尊严的支点，坠落遂难避免。

工具理性在两部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前者呈现为教育制度的效率逻辑，后者表现为救亡叙事的功利逻辑。其区别在于，西方语境下，人们在获得工具理性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提升的同时，个体也被限制在“被控制和压制的境地，而且愈演愈烈([11], p. 149)”，仿佛“困于铁笼中”[9]；长期严峻艰苦的政治军事斗争与你死我活的民族搏斗则使中国社会中个人思想的启蒙被政治救亡的主题所压倒，被民族生存危机所笼罩[12]，“任何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0], p. 75)”。其共同结果是，把“客我”塑造成单一严苛的监督者，将“主我”的创造性、情感性与尊严性从正当性谱系中排除，从而切断自我整合所需的内在对话。

#### 4. 自我认同的文化语境塑造

差异性的自我认同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被书写出来的经验：不同的制度传统、道德语汇与他者目光，以各异的叙事手法、意象系统与身体书写进入文本，从而塑形人物“我是谁”的可说方式。

##### 4.1. 德国：制度化规训与个体的异化

汉斯的崩溃关联于其社会角色的丧失，被教育体制的驱逐意味着精神堡垒的崩塌，其身死正体现了个体被强大的、非人性的社会机器所摧毁。规训机制的暴力施加于主体的自由意志之上，对个体进行异化，使之将个人价值等同于某种特定可见的价值标准。在《在轮下》中，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和强调服从、纪律的价值观念作为客观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扮演这一暴力机制，最大程度挤压个体精神世界的生存空间。符腾堡的教育体系是新教虔敬主义和普鲁士精神的结合体，注重勤奋、服从、纪律和成就。这种文化语境塑造了特殊的“泛化的他人”——通过制度化的规训机制，将社会期望内化为个体的“客我”。《在轮下》中，这种制度化规训表现为一系列具体机制：严格的时间安排、密集的考核评价、等级化的管理模式、对异质性的排斥。时间的制度化正是客观文化膨胀的首要表征，其意义在于建立节奏，加强特定的活动，重复的周期进行调节。汉斯的生活被纳入这一时间制度的掌控之下，个体的自发性，即“主我”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繁重课业则构成客观文化膨胀的另一表征：知识的系统化。这一绝对理性系统的内在逻辑与个体生命体验并无关联[6]，汉斯的天性敏感、艺术倾向在这些机制中缺乏生存空间表达场域，在获得独立于个体的自主性的客观文化面前，个体丧失对知识主动吸纳的权利，转而成为知识的奴隶。德意志文化中个体通过教育实现全面的精神发展与自我完善的教养(Bildung)传统异化为训育工序[13]，汉斯失去与自然的联系和诗歌共鸣的感知能力，其与内在建立联系仅剩的唯一渠道——与海尔纳的友谊——也被视为对制度的威胁，最终被无情摧毁，彻底切断。

##### 4.2. 中国：伦理模范与外部歧视的困境

而在东方儒家文化圈语境中，则更强调外在的社会评价对个人的影响。他者目光与评价对自我价值的评估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个体的“泛化的他人”是由民族集体命运、传统伦理规范以及外部殖民者的歧视性目光共同构成的压迫网络，“主-客我”之间的冲突则表达为个体身体欲望与宏观的民族集体命运、传统伦理规范的纠缠。“他”的崩溃聚焦于伦理与民族的耻辱，身体行为的失控与民族羞耻直接关联，对于其所学习生活的日本社会而言，“他”的身份并非一般的异乡人，而是齐美尔理论中的“陌生

人”(The Stranger): 既在场, 又因族群标签而被固定在不可消除的距离之中[6]。这一距离构成“他”持续处在被看、被分类、被排斥的客体化状态下, 外部凝视被内化为更为严苛的自我注视与审判。与此同时, 深重的民族危机与严苛的理学传统构成的“救亡-成才”宏大叙事作为客观文化, 要求个体将自身价值转化为民族功用[14]。个体的欲望经验无法被纳入这一可交换的效用逻辑, 便转化为对自身人格的羞辱、污名与惩罚: 作为“弱国子民”的民族自卑摧毁“他”的个体尊严, 传统性道德的内化令“他”因自然欲望而自罪。“他”对日本人目光的极端敏感, 对“面子”的强烈关注, 向祖国的泣血痛诉, 正是个体对“陌生人”身份带来的客体化凝视、国族叙事代表的客观文化的反抗, 是带有强烈情绪宣泄的自我毁灭, 是个体在身心与民族的双重污名中寻求自我毁灭与解脱的体现。

### 4.3. 差异化塑造的比较分析

在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在轮下》中, 汉斯的身份认同危机成为外在社会判定过程, 叙述者的视角差异隔绝了作为主体的汉斯自我表述的可能, 个体的充沛情感被训育机制强行镇压与无情抹除;《沉沦》自叙传的叙事则是对个体心灵的“示众”暴露与道德审判; 二者的区别总体上反映了德中文化在个体与社会关系、身体观、羞耻感表达上的深层差异。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语境对青年精神困境的塑造作用:

一方面, 两种文化语境均产生了强大的“泛化的他人”, 作用于青年个体的“主我”, 并对其形成压抑, 从而导致了身份认同危机, 体现现代性转型的普遍矛盾。另一方面, 两种文化语境塑造了不同的危机形态: 德意志的制度化规训对个体价值进行异化, 其冲突场域则主要集中在教育制度内。在中国, 外患侵袭与旧伦理结构延续的社会性质致使个体需承受民族危机与伦理规训的双重压抑, 其冲突的场域是身体和民族身份。这些差异是对两国迥异文化特征的具体反映, 同时也是对两种不同现代化路径的侧写: 德国的现代性具有“内在生成”的特点, 其矛盾主要来自社会内部的理性化过程; 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外在诱发”的特点, 其矛盾主要来自外部冲击与内部传统的碰撞。

## 5. 结语

通过对黑塞《在轮下》和郁达夫《沉沦》的细读比较, 本文在米德符号互动自我理论(“主我”、“客我”、“泛化的他人”)与齐美尔社会形势论共同搭建的理论框架下指出: 尽管德中语文化语境迥异, 汉斯与“他”的悲剧共享同一根源——加速变迁的社会将“泛化的他人”异化为高压期望, 使“客我”僵硬并压制“主我”的自然诉求, 最终导致自我认同崩塌。这揭示了现代性转型的普遍张力: 当结构重组、规范松动而社会难以提供包容、多元、尊重主体性的认同空间时, 个体坠落便成为结构矛盾的个人化显影。文化语境则规定了危机的面貌: 威廉时期工具理性化的教育把学校化作规训场域, 汉斯的自我毁灭象征“灵魂被机器碾压”; 而在半殖民中国中, 民族危机与礼教禁欲叠加, 他者凝视与内在道德双箍, 使“他”的身体与欲望成为认同战场, 显出“防御性现代性”的代价。作为历史精神的敏感探针, 两部作品以艺术穿透力将结构性压力化为可感的生命叙事, 对重思教育、关照青年心理与营造包容的文化环境, 仍具切身警示。

## 参考文献

- [1] [美]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霍桂桓,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2] [德]赫尔曼·黑塞. 在轮下[M]. 张佑中,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 郁达夫. 郁达夫小说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4]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M]. 王鲲,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5]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M]. 韩震,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6] [德]齐美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社会学论文选[M]. 林荣远, 编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林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3.
- [8]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9]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10] 李泽厚. 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M]. 马群林, 编选.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
- [11] 王锋. 立法论证研究[M]. 何勤华,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2] 李泽厚. 李泽厚集 共 10 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13] 张佩芬. 黑塞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4]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